



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關係之俄國 資料介紹，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in Russia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KMT, CCP and Comintern, 1920s-1940s

余 敏 玲 (Miin-ling Yu)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1 年秋天，蘇聯解體。過去一向被列為機密的檔案，特別是關於蘇聯共產黨及其相關機構的檔案，頓時門戶大開。其後的幾年堪稱為俄國檔案開放的春天。俄羅斯現代史檔案保管與研究中心 (Rossiiskii Tsentr Khraneniia i Izucheniia Dokumentov Noveishei Istorii, RTsKhIDNI；現名為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 RGASPI)¹、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把握時機，整理過去不為人知的共產國際與國共兩黨的文獻，編輯成書，相繼出版。²筆者有感於光憑檔案不足以令人了解歷史全貌，當時的出版品與時人著作的重要性不亞於檔案，因此提出計畫，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合作蒐集現存於俄國，以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關係為主題的出版資料。這個計畫（編號：RG009-D-95）得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共計三年完成。本文所介紹的史料，即是該計畫所蒐集的成果。

自 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止，從俄國

所蒐集到的資料，計有圖書 184 種（俄文 178 種，中文 5 種，英文 1 種），中、西文期刊 18 種（俄文 8 種，英文 1 種，中文 8 種），中文報紙 1 種，論文 342 篇（俄文 234 篇，中文 108 篇），俄文剪報 736 篇，照片 112 張，檔案 7838 頁。除了照片與檔案存放於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之外，其餘資料均存放於近史所圖書館。由於目前國內圖書館的俄文圖書編目，均採用羅馬拼音，為使讀者便於查閱，本文的人物與書籍的俄文名稱亦採用羅馬拼音。

自 1920 到 1940 年代，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三角關係，時起變化，波詭雲譎。1921 年共產國際培植中國共產黨成立。其後經過多次接觸與折衝，1924 年中國國民黨決定施行聯俄容共政策。1927 年國民黨清共之後，國共關係陷於谷底。特別是該年 12 月發生廣州公社事件，南京國民政府以各地蘇聯領事館及其商業機關協助中共暴動為由，於 12 月 14 日宣布對蘇斷交，1932 年 12 月 12 日中蘇復交。其後至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為止，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三方的關係依然錯

1 關於俄國檔案典藏地詳閱余敏玲，〈俄國主要檔案館現況簡介〉《近代中國》140 期，頁 200-217。

2 VKP (B), Komintern i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Dokumenty, t.1. 1920-1925 (Moscow, 1994); t.2 1926-1927, 1996; t.3 1927-1931, 1999。第一卷的中譯本有二：一為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0-1925)》(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另一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 (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 (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後者又於 1998 出版第 2 卷中譯本，第 3 卷預計今年出版。



綜複雜，時有起伏。過去因為政治因素，除了政治宣傳之外，對於這個議題難以作客觀地學術研究。現今政治加諸於學術的限制已經消失，議題已不再是禁忌，實有必要重新評估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本計畫所蒐集的大批印刷資料，在出版當時或後來亦僅有蘇聯黨政高層人員才能閱讀，因為蘇聯解體方才公諸於世，現在這些資料都存放在近代史研究所，提供學者參閱。筆者希望學者有機會透過已出版的檔案與本計畫所蒐集的資料，能更深入地探討國共與共產國際複雜的三角關係：當時的蘇聯專家如何看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了解與實際的情形出入有多大？而蘇聯當局對他們的建議又採納多少？所謂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失敗，確是因為其不諳中國國情，抑或是在當時情況之下，別無他法？國共兩黨對於共產國際是否有認知上的差距？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如何影響國共勢力的消長？

在執行計畫期間，筆者與俄方合作的學者曾經遭遇許多始料未及的困難。1990年代，俄國情勢的不穩定，不但表現在政治經濟，也出現在檔案圖書的管理。檔案圖書管理政策的多變，管理人員的保守心態，幣值不穩導致的維修經費不足、人員缺乏、開放時間不固定等種種問題。例如，計畫初始，筆者曾與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現併入俄羅斯當代史國家博物館，Gosudarstvennyi Tsentral'nyi Muzei Sovremennoi Istorii Rossii, GTsMSIR）主管洽談複製照片，得到一連串「沒問題」的回應，卻在交出照片複製申請單之後，館方突然以「外國人每年只能申請沖洗30張照片」為由，拒絕過額沖洗，這條規定後來也適用於俄國學者身上，使得計畫中所蒐集的一百多張的照片，前後共費時三年才完成。

再者，資料的運輸亦曾是一大難題。按照當時俄國政府規定，凡是舊出版品（一般而言，指的是1950年以前出版品，但有不少例外）均列為受管制出境品。若要將其郵寄出境，需到俄國文化部取得出境同意許可。在本計畫執行期間，文化部每週受理書籍文獻出境申請的時數不超過8小時，申請時不但得親自攜帶資料去審查，還得另繳若干費用（因書而異），費時費事至極。為免除這種官僚作業，又鑑於俄國郵政服務與效率不佳，為避免原始檔案資料郵寄遺失，結果是無論早期出版品或檔案都必須輾轉託人搭機親自帶回臺北。

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本計畫未能蒐集到典藏在俄國國家社會政治圖書館（原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專用

圖書館）的資料，如 *The Canton Gazette*, *The People's Tribune*。這些在清黨前後分別出版於廣州與武漢的期刊，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圖書館均難以覓得，該館雖然期數殘缺不全，仍是十分珍貴的材料。俄國國家社會政治圖書館原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專屬圖書館，在蘇聯時期曾是全國最好的圖書館，可惜自蘇聯解體後，經費急遽萎縮，不但裁減調閱報紙的工作人員，同時也因缺乏製作微捲的機器，致使原來欲蒐集的報紙期刊無法完成。

檔案的蒐集原不在計畫之內，後因一些現實因素，在有限的經費下，還能蒐集到7000多頁的資料，實屬不易。很多原本欲蒐集的主題，均因館方不開放，不得不作罷。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資料豐富，欲全部蒐集一個主題，經費也有不足之虞。因此最後決定每一主題作若干選樣，讓讀者得知一些文件檔號，俾便將來檔案開放之後，能進一步利用參閱。基於種種難以克服的現實因素，本計畫所蒐集到的資料，很難說已達到網羅齊全的地步，但是主要著作，均已包括在內，並且盡量呈現不同主題的研究。

● 資料介紹

一、照片

這一百餘張照片來自莫斯科革命博物館，絕大多數是蘇聯在華顧問所拍攝，所反映的是1924年10月到1927年12月的活動。其中有些照片國民黨黨史館也有收藏，但因為多是從報章雜誌間接翻拍而來，效果欠佳。而這些照片乃是由原底片沖洗而成，清晰度遠較翻拍為佳。

照片內容主要是關於國民黨東征、北伐（程潛第6軍最多）、遊行示威、蘇聯顧問在華（包括休閒）活動、蘇聯飛機等。其中最突出的一張合照，攝於孫逸仙過世當天早晨在其北京寓所前，內有李大釗、鮑羅廷、汪精衛、宋子文、胡漢民等人（編號19777）；另有一張汪精衛在廣州一場演講之後的照片（1926年）。曲終人散，工作人員忙於收拾之際，四周標語依然飄揚，無巧不巧，在汪精衛背後看得最清楚的二字，竟然是「漢奸」（編號19859）。

二、剪報

除了約有10篇左右是1920年代之外，其餘的都是



1931年底至1936年底。這些剪報主要是從當時的蘇聯報紙如《真理報》、《消息報》或其他地方性黨報而來，剪報所呈現的中國情勢，頗能反映當時蘇聯官方立場或蘇聯希望其人民所相信的立場。其重點是宣傳中國共產黨在蘇區的成就，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即使從這樣官方的刊物，也可以看出蘇聯的兩面外交。雖然南京政府於1932年年底與蘇聯復交，蘇聯政府對南京國民政府仍時有批評。此外，蘇聯雖然譴責日本對東北的侵略、對滿洲國的控制，但是蘇聯同時也提議，透過交涉欲將中東鐵路販賣給日本。基本上蘇聯不希望與日本發生直接衝突，若有這樣的衝突則由中國來承擔，即萬一有戰事，是中國與日本交戰，不是蘇聯與日本交戰，所以蘇聯的官方刊物可以說是極盡煽動中國人民反日情緒之能事。另一方面，除了日本帝國主義之外，蘇聯在不完全激怒對方的情況下，對於美英等資本國家的帝國主義的批評也不遺餘力。

三、論文

蘇聯最早關於中國時勢或政治的俄文論文多發表於《革命東方》(Revolutsionnyi Vostok)、《新東方》(Novyi Vostok)、《民族生活》(Zhizn' Natsional'nostei)等雜誌。這些文章雖然多屬泛論性質，對當時一般蘇聯讀者而言，仍不失為瞭解中國的最佳管道。1920年代中期以後，除了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期刊外，關於中國的文章以發表在《共產國際》(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雜誌為多。在《共產國際》發表的文章，不但反映出蘇共對華政策，對中共領導人的態度，也可看出中國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並能促進對中國共產黨演變的瞭解；其中刊登的論文重點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訓示與決議、中國的革命、反帝鬥爭。

中文論文則是來自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簡稱東大，KUTV)³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簡稱孫大或中大，UTK)⁴的出版品。主要是兩校的中文教材。除了涉及中國革命史外，還介紹蘇聯革命史、馬列主義，蘇聯對中

國革命的政策與辯解等等。

四、期刊報紙

(一)《中國問題資料》(Materialy po Kitaiskomu Voprosu)：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教研室於1927年開始出版到1928年停刊為止，共出版16期。這份俄文月刊旨在介紹中國時事及其歷史背景，內容是從中國報章雜誌選譯有關中國經濟、政治的文章，並附有每月各日大事記(國民黨、共產黨活動，工農運動等)、新書書目。最初只計畫在校內流傳，後來也對外發行，且頗受歡迎，成為俄國讀者瞭解中國時事的主要資訊來源。1928年1月，蘇聯當局以中國學教研室為基礎，成立了中國科學研究院(Nauchno-Issledovatel'skii Institut po Kitaiu pri UTK, NIUK)，隸屬於中大，其宗旨在研究革命活動。自1929年起，《中國問題資料》改名為《中國問題彙刊》(Problemy Kitaiia: Zapiski Instituta)。第1期的主編是沃林(M. Volin)，他在該期的一篇文章〈中國反動派陣營〉(V lagere kitaiskoi reaktsii)被批評沒有正確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的角色，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因而被解除編輯職位。從第2期(1930年)開始至停刊為止，均由米夫(P. Mif)擔任主編，該刊原預定為月刊，事實上每年只出版一、兩期，到1935年停刊為止，共出版15期。此時刊物的流傳有嚴格限制。內容包括研究論文、評論、書目、文獻資料等。第1期有一半的文章關於歷史，另有用理論為中國革命辯護，反駁所謂反動派的觀點；徹底批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關於中國革命的觀點；揭露中國托派的反革命行動等。自第2期開始，歷史性文章遽減，注重現實政治經濟的研討，集中討論三民主義、陳獨秀主義、中國社會性質、亞細亞生產方式。1932年則完全沒有歷史方面的文章，這也與當時的整個大環境有關，蘇聯五年計畫強調技術的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日本的侵略等，令人開始懷疑史學的準確性，⁵直到1933年才又有歷史方面的文章出現。

此外，中國科學研究院還出版《中國科學研究院院報》(Biulleten')，將關於中國的時事報導譯成俄文，並

3 1921年春天，俄共為訓練亞洲革命幹部，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Kommunisticheskii Universitet Trudiashchkhia Vostoka)，並設有中文班。1928年9月東大中文班與莫斯科中山大學合併，稱為共產主義中國勞動者大學。

4 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專門訓練中國革命幹部的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1928年改名為共產主義中國勞動者大學(KUTK)。

5 尼基福羅夫(V. N. Nikiforov)，《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Sovietskie Istoriki o Probelmakh Kitaiia) (Moscow, 1970)，頁129。



報導中共大會決議、工農運動或蘇聯的決議等；政治、經濟報導亦是重點之一。1931年開始報導中共蘇區、日本侵略、國民黨剿共。最初（1928-1930年6月）由中大出版，自1930年8月的第6期，改由國際列寧學校（Mezhdunarodnaia Leninskaia Shkola）出版；其後又由共產主義科學院（Kommunisticheskaia Akademiia）接管出版。

（二）《廣州雜誌》（Kanton）（俄文）：1926年開始在廣州出版。第1至第5期用的名稱是《布爾什維克在廣州》（Bolshevik v Kantone），第1至第7期均是秘密流傳。按照尼基福羅夫的說法，1927年6月20日在武漢出版的第11期是最後一期，但是本計畫所蒐集到的最後一期是在1927年9月出版。內容分一般政治、經濟、軍事、廣東省政治生活、新書介紹（戴季陶的三民主義哲學基礎；毛澤東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五大類。這份刊物稿源顯然來自廣州的蘇聯顧問組成的中國研究小組，他們定期集會，報告革命運動、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等。《廣州雜誌》主要是蘇聯在華顧問內部發行的刊物，每期發行50份而已，每一份都有編號。在共產黨眼中所謂的「中國革命高漲時期」（1926年年底至1927年年初），《廣州雜誌》是當時蘇聯關於中國研究最嚴謹的刊物之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7次擴大會議、聯共第15次代表大會、莫斯科黨員大會中，曾多次引用其中的文章。⁶

（三）《蘇聯的中國學》（Sovetskoe Kitaevedenie，季刊）：原為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創刊於1958年1月，1959年併入《東方學問題》（Problemy Vostokovedeniia），1961年改名為《亞非人民》（Narodi Azii i Afriki，雙月刊）由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和非洲研究所聯合主辦。內容包括歷史、中蘇關係、經濟、語言、書評（蘇聯、中國、歐美出版有關中國的書）、蘇聯國內外的研究與教授中國學的機構。每期附有作者簡介與新書要目。該刊每篇文章最後均有一段中、英文摘要。第一期發刊詞闡明雜誌的宗旨是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經驗，發表有關中國的歷史、經濟、文藝、語言、文化及國際關係的研究，有系統進行反資產階級思想及反對篡改中國研究而

鬥爭，對中國學方面的重要問題進行辯論，積極地促進蘇中兄弟般友誼的發展；同時，郭沫若並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分為該刊提辭，希望藉此刊物以實事求是的研究精神，促進中蘇兩國相互瞭解，完成兩國共同的事業。

1966年，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成立，它是蘇聯研究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機構，也是情報機構，政治色彩十分濃厚。1972年開始出版其機關刊物《遠東問題》（Problemy Dal'nego Vostoka，季刊）。⁷《遠東問題》的發行宗旨與《蘇聯的中國學》大異其趣。其發刊詞中特別表明要揭發美帝的陰謀，美國對越南的侵略行為與蘇聯的英雄式反對侵略；另一主要任務是致力於促進蘇中關係正常化，且要與毛澤東分子的大漢民族主義鬥爭。1973年起，該刊物增闢「圓桌會議」專欄，以回答讀者問題的方式，嚴厲批評中國當時的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制度等。1979年第3期刊有〈篡改世界歷史的人〉為題的圓桌會議，涉及中俄邊界史、蘇中關係史，直到蘇聯解體前後，才試圖開始擺脫濃厚的政治色彩，並常有重要的檔案文件發表。

（四）《The Communist 共產黨》（中文，上海，不定期）：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刊物。由上海馬克斯主義學會發行，亦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份黨刊，1920年11月7日為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週年而創刊，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6期，每期約32頁，李達主編。其宗旨是根據當時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需要，宣傳共產黨知識，大量介紹第三國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共經驗、列寧學說。

另有《政治生活》（中文，北京，週刊）這是國共聯合時期，由北京大學中共北方區執委會編輯、發行（聯絡人劉鳴先），宣揚共產主義，反帝、支持工農運動。第70期是中山先生紀念號。本計畫所蒐集的可以部分彌補國民黨黨史館收藏的不足。國民黨黨史館收有1924年4月至12月，1925年1至5月，而本計畫則有1926年1月至8月（第63期至83期）。

（五）反對蔣介石與支持武漢政權的刊物

1.《革命》（中文）：留美學生中山學會會刊。編輯部設在美國史丹福大學，這是份反蔣的共黨刊物，內容

6 同上，《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頁138。

7 1973年以俄、英、日文出版；1980年又增加西班牙文版。英文版（Far Eastern Affairs）的內容比俄文版較為簡略。雖然主要論文仍有翻譯，但書評或大事記等常在英文版中被省略。因此本計畫中雖有部分英文版本，但仍以俄文為主。自1972年至1996年止，期數蒐集完整。



有時論（類似讀者投書）；李道煊，〈蔣介石反叛與今後中國革命〉；黃恭壽，〈蔣介石之罪惡〉；並有介紹蘇聯教育短文。

2. Chinese Correspondence (《中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通訊》)(英文，半月刊，武漢出版)：1927年1月5日在武漢出版，同年5月1日改名為 Chinese Correspondence Weekly Organ of the C.E.C. of the Kuomintang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週報》)，這是國民黨左派所發行的刊物。其發刊詞謂中國革命從位於珠江的廣州擴展至位於長江的武漢，革命的中國代表所有被壓迫民族與被剝削階級的反抗，而反對帝國主義則帶有世界意義。創刊之時，國民黨中央已分裂成武漢、南昌二地，但是內容並沒有任何反對蔣介石的言論，到了5月改名之際，已是蔣介石清共之後，該刊除了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開除蔣介石黨籍之外，並謂此次改名是為集中黨的宣傳與指導中國革命和國民黨的發展方向。內容以帝國主義國家（英、日）在華活動，強調中國人的被剝削為主。比較特殊的是特別報導國際勞工領袖代表團訪問廣州、湖南、武漢等地活動，其成員包括 Tom Mann（英國共黨）、Earl Browder（美國共黨）、Jacques Doriot（法國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羅易（M. Roy，共產國際代表）、Snydor Stoler（代表團秘書），該團聲稱來華目的是為恭賀中國革命的成功與保證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3.《漢口青年》(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青年部)(中文)：第8期〈二七〉紀念特刊：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爭自由運動（1927年2月17頁）。內容包括：劉胤〈二七紀念〉；祝存照〈青年紀念二七的意義〉；劉胤〈二七的死者——施洋〉；風灰〈從二七說到一三〉。

4.《漢聲週報》(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中文)：第4期，蘇俄革命九週紀念特號，1926年11月7日，16頁。內容包括：宛希儼〈編輯者言〉；鐵羅尼〈蘇俄革命九週紀念〉；蔣介石〈聯俄政策的意義〉；周佛海〈十月革命的意義〉；董用威〈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魏亮生〈為什麼要紀念十月革命〉；耿仲釗〈列寧主義與中山主義〉；鐵羅尼〈俄羅斯的軍隊與十月革命〉。

(六)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期刊：《每週要覽》與《共產雜誌》均是由共產主義中國勞動者大學印行。這兩份刊物是該校為實踐教學中國化（即教材內容以中國，而

非西方為主）的努力之一，其中加入許多中國的歷史與時事等，並將在中國的外文報紙有關時事部分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學生閱讀，俾使學生對中國國內發展不至脫節，且能在上課時引起討論，並適時灌輸「正確」的政治思想。

《每週要覽》以翻譯中國的時勢新聞為主，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層面。《共產雜誌》只出了2期，內容是評論蘇聯與中國現勢，刊登共產國際決議信函，宣揚革命高潮來臨，批評右派的錯誤。

(七)《共產國際月刊》(中文版)：俄文版的《共產國際》原創刊於1919年5月1日，由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同時用俄、法、德、英文發行，俄文版的篇幅最長。初期內容焦點集中在東、西歐、美國，直到當年年底才有一篇文章談及亞洲（韓國社會運動，1919, 11-12, No. 7-8）。1920年夏天，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綱要初稿〉(Tezisy po natsional'nomu i kolonial'nomu voprosam)問世，東方問題方才受到重視。但即使如此，直到1924年才有關於中國的文章出現。中文版到1930年2月才創刊，似乎是由莫斯科的無產階級書店出版，原為月刊，1936年起改為雙月刊。內容除了特別報導中國的情況之外，也翻譯外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論文。

(八)中文報紙：《工人之路》(Rabochii Put') 1924-1938年(伯力出版，雙日刊，微捲)。

1922年3月1日創刊於前遠東共和國的首都赤塔，由全俄中央職工蘇維埃遠東部出版。初名為《華工醒時報》，1923年8月由赤塔移到海參崴出版，改名為《工人之路》後，改在伯力出版，發行量每期約為一萬份，其主要發行對象是在蘇聯遠東的華僑，並且也是宣傳中文拉丁化的主要刊物之一。丘古耶夫斯基(L. I. Chuguevskii)在其〈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1918-1937〉一文中，⁸談到《工人之路》只出版到1937年，事實上是到1938年才停刊。本報是蘇聯對華人社會政令宣導與研究蘇聯遠東華人社會十分重要的刊物。

五、書籍

(一)孫逸仙與三民主義的研究。孫逸仙的《實業計畫》俄文版於1925年問世。這本書可能是在蘇聯出現

⁸ 丘古耶夫斯基著，余敏玲譯，《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7期，頁157。



的最早有關孫逸仙的書，收藏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印行 5000 本。1928 年繼而有甘乃光翻譯的《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維廉斯基—西比達可夫 (Vladimir Vilenskii-Sibirskii) 則是蘇聯十月革命之後，最早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的專家，他於 1924 年出版《孫逸仙——中國革命之父》(Sun'-iat-Sen : Otets Kitaiskoi Revoliutsii)，這本小冊子有一半的篇幅來自翻譯當時國民黨的資料，1926 年，他又出版一書：《國民黨——中國革命黨》(Gomindan : Partiia Kitaiskoi Revoliutsii)。當時大多數蘇聯的中國專家咸認孫逸仙的意識型態屬於小資產階級，但是 1927 年國民黨的清共促使蘇聯專家開始質疑這樣的解釋是否正確？三民主義是否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此，莫斯科的中國科學研究院 (NIKI) 成立了一個三民主義研究小組，研討三民主義的本質。安東諾夫 (K. V. Antonov)、卡拉—穆爾札 (G. S. Kara-Murza)、艾真須塔特 (A. Aizenshtadt) 分別提出口頭報告，成為日後若干書籍與論文的基礎。例如，安東諾夫的《孫文主義與中國革命》(Sun'iatsenizm i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1931) 不但利用孫逸仙本人的著作，還參考俄文與英文作品。他認為孫文主義不但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也意味著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孫逸仙的三大策略：聯合蘇俄、聯合中國共產黨、展開群眾運動，即含有十月革命的影響。孫在理論上雖不願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實際上卻是支持國際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安東諾夫認為蔣介石清黨之後的三民主義遭受竄改。

(二) 1920 年代的蘇聯中國專家的著作。他們有許多原來對中國認識甚少，後來基於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而成為研究中國的專家。例如，巴枯林 (A. V. Bakulin) 所著的《中國革命武漢時期雜記》(Zapiski ob Ukhanskoi Periode Kitaiskoi Revoliutsii, 1925-1927gg) 即是將他在武漢所見所聞，並參考當時的演講、通令、報導等材料寫成，主要談的是群眾運動與國民黨的偏離革命，中共反而甚少提及。維廷斯基 (G. Voitinskii) 則是另一例。他的《中國現況》(Chto Proiskhodit v Kitae?) 一書，對孫逸仙的評價高於吳佩孚。他認為國民黨的基礎是小資產階級；

孫逸仙與國民黨左派代表小資產階級，國民黨右派則代表商人資產階級。馬加爾 (L. I. Mad'iar, 原籍匈牙利)，1926-1927 年在共產國際工作，後來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新聞單位工作，他的《當代中國的革命情勢》(Sovremennoe Sostoianie Kitaiskoi Revoliutsii) 認為蔣介石政府的政策是買辦資產階級與中國的結合。他也是研究中國土地問題的專家。另一位研究中國的重要人物米夫，著述甚多。他於 1929 年擔任中國學研究所所長，1928-1937 年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1928-1935 年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處副主任，1935 年起擔任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的政治助理。但這位中國學研究中最著名的史達林派，卻仍難逃史達林的大整肅，死於 1939 年。波波夫—塔提夫 (N. M. Popov-Tat'ina) 是位日本專家，也是海軍軍官，在戰爭研究院工作，他的《中國經濟概論》(Kitai : Ekonomicheskoe Opisanie) 是具有指南性質的參考書，蒐集工業、財政、貿易資料而寫成。他認為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並不多，但他們積極奪取中國的地盤，作為將來擴展之用。中國外債雖多，如果能恢復到正常情況，則償還外債能力亦快。塔爾哈諾夫 (O. S. Tarkhanov) 於 1925-1926 年在中国工作，後來在加倫將軍 (Galina, Vasili Bliukher) 的蘇聯遠東軍工作。他的《殖民地革命的土地問題》(Agrarnyi Vopros v Kolonialnoi Revoliutsii) 認為美國式的經濟發展道路並不適用於革命情況複雜的中國。施泰因 (V. M. Shtein) 於 1926-1927 年曾擔任廣州政府的財政顧問，著有《中國財政危機概論》(Ocherki Finansovogo Krizisa v Kitae) 一書。伊文 (A. A. Ivin) 則是在當時蘇聯中國專家中極少數精通中文者，他於 1917 年畢業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還沒去中國之前，他已對中國有相當認識瞭解，從 1917 至 1927 年曾在北京大學任教。此外，切列帕諾夫 (A. I. Cherepanov) 或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 (V. V. Vishniakova-Akimova) 的書，雖在臺灣與大陸均早有中譯本¹¹，但其中囿於敏感的政治形勢，有許多被刪減修改的地方，因此本計畫仍收入俄文原版，可有互相參照修改之處。

(三) 瞭解蘇聯中國學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書。施

9 保加利亞人，曾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從 1935 年至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為止，一直是共產國際總書記。

10 原姓伊凡諾夫 (Ivanov)，伊文是筆名。在北大教書時，漢名為伊鳳閣。

11 大陸譯本為：亞·伊·切列帕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著，《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卡奇科夫(P. E. Skachkov)編的《中國圖書目錄》(Bibliografiiia Kitaiia)蒐集了1730-1930年關於中國的俄文書籍與論文目錄，將自清代以來200年的俄文中國學文獻作一有系統的整理。第一版於1932年問世，1960年出版的增訂版，在時間上多了25年，資料上則多出一倍。其後這種書目整理介紹工作則由尼基福羅夫(V. N. Nikiforov)等人接棒。施卡奇科夫同時也是早期研究俄中關係的專家，但焦點在清廷與沙俄的關係。尼基福羅夫的《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則對於蘇聯早期至1949年的學者，不僅有詳細的背景介紹，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有概述與評論，雖然他的評論難免帶有強烈的馬列觀點與官方立場的色彩，但仍是瞭解蘇聯中國學研究最重要的入門書之一。米立班德(S. D. Miliband)編的《蘇聯東方學者傳記辭典》(Biobibliograficheskii Slovar' Sovetskikh Vostokovedov)則是本很好關於蘇聯早期與當代主要學者研究中國的參考書。

(四) 當代研究中國的專家的著作。如研究國民黨的梅利克謝托夫(A. V. Meliksetov)，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的格魯寧(V. I. Glunin)和杰柳辛(L. P. Deliusin)，研究1920年代中國革命的格里戈里耶夫(A. M. Grigor'ev)。這些人的著作都是要瞭解當代蘇聯對中國革命或政治問題不可或缺的文獻。

(五) 卡片資料。勾普涅爾(S. I. Gopner)編的《索引：共產國際十五年1919-1934》(Ukazatel' 15 let Kominterna, 1919-1934)，用卡片盒裝，每一張卡片含問題、資料來源、答案，共227條目，作為宣傳用。他們在中國的宣傳到底發揮多大的效果，值得進一步探討。

六、檔案

所有的檔案均來自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包括越飛寫給列寧等俄共領導人報告中國情勢的九封信，托洛斯基派對中國革命的論述，蘇聯在華顧問與共產國際的通信與報告，存於特別檔的蘇共政治局關於中國的決議(1920年代)，國共內戰談判交涉之會議記錄等。

(一) 越飛寫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共產國際領導

人關於中國情勢的九封信(1922-1923)(俄文，共215頁)。這九封信中目前只有兩封(第七、八封)已經出版。¹² 這些信在俄國外交部檔案館亦有收藏，然而該館門禁森嚴，即使備妥所有必要文件證明，仍未必能登堂入室看到目錄，遑論檔案。所以能得到這九封信十分可貴。它們是研究越飛對東方(中日)革命觀點的最佳材料。其主要內容是越飛對中國政治情勢的觀察，並建議蘇共中央在中國可能合作的伙伴，包括他與北京政府關於蒙古與中東鐵路的談判。其中最有趣的是他建議蘇聯領導人對東方的政策，特別是對中國，應秉持無私的態度，與中國人民建立友善的相互關係，展現俄國人民對民族解放鬥爭的同情，而不是以談判獲利為主。他這樣的想法確實具有當時共產國際高唱的國際主義精神，可惜這樣的建議連自認最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托洛斯基都不贊成。

(二) 1920年代(中、俄文，共1221頁)蘇聯在華顧問與共產國際的通信與報告，雖已有部分出版，仍有相當數量的報告未公諸於世。例如加拉罕與鮑羅廷的通信(F. 627, Op. 1, D. 4)；鮑羅廷長達60多頁的軍政報告(孫逸仙訪日，廣東商團事件，東、西線戰場，對陳炯明之役，廣東的海軍，粵軍第1師砲兵與黃埔軍校，蘇聯教官在黃埔工作草案，黃埔地區要塞，軍事部門預算報告(F. 627, Op. 1, D. 7)；廣東軍事顧問尼洛夫(A. I. Nilov，原名Pavel Sakhnovskii)寫給蘇聯大使館武官格克爾(A. I. Gekker)關於華南軍政情況與工作的報告(F. 627, Op. 1, D. 8)；廣州軍事團寫給蘇聯使館軍事武官葉戈羅夫(A. I. Egorov)的軍情報告，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各地簡報(F. 627, Op. 1, D. 13)；蘇聯在華軍事工作的問題，在張家口的蘇聯顧問表，統一國民革命軍軍校組織的報告，重組國民革命軍的指示，評估在華軍事指導工作及其資料(F. 627, Op. 1, D. 15)；Anders與Zimin等關於馮玉祥國民軍報告(F. 627, Op. 1, D. 18, D. 23)其中最特殊的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的各部隊人數統計，與鮮為人知的蘇聯顧問組織的中央軍政俱樂部情形。這個俱樂部出版的《廣州雜誌》內容詳上述。

(三)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1925)(中、俄文，

出版社，1985)；臺灣則有國防部情報局翻譯：《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三部，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1926-1927》，《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四部：中國兩年回憶錄，1925-1927》(臺北，民65)。

12 見俄國遠東研究所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合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第一卷，文件57與60。



共 270 頁)：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參加蘇聯第二屆共青團大會紀錄；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SY) 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會議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1 至 41 次會議記錄；第二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SY) 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記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第 1 至 10 次會議記錄。

(四) 托洛斯基派對中國革命的論述 (俄文，共 953 頁)：自 1924 年開始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權力鬥爭已逐漸公開。蔣介石的清黨正好提供托洛斯基派更多的火藥來攻擊史達林，此舉迫使史達林對華政策即使有誤，也必須「堅持到底」。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特藏的托洛斯基檔案，也沒有這些托洛斯基派的文件¹³。1926 年初，國民黨以同情黨的身分加入共產國際。托洛斯基指責史達林派對中國革命的不擅應變的證明之一，即是 1927 年春天國民黨清共之後，國民黨在共產國際的黨籍直到 1927 年 11 月仍未被除籍 (F.495, Op. 2, D. 83, L. 35)。

(五) 特別檔——蘇共政治局關於中國的決議 (1924-1929) (俄文，共 305 頁)：除了有 8 份文件已出版之外，其餘均是未解密的檔案。內容以政治為主，也有經貿方面：關於中東路問題及俘虜，資援廣州政府、馮玉祥、武漢軍隊。其中最特別的是南京政府雖於 1927 年底片面宣布對蘇聯斷交，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仍決議，繼續與張作霖的北京政府打交道，希望中國釋放被捕的蘇聯人，蘇聯允許繼續購買中國茶葉，並且認為只要中國政府釋放在北京所逮捕的蘇聯工作人員，即可討論中蘇復交。

(六) 1930 年代 (中、英、俄文，共 648 頁)：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駐華人員更動，中東路及其戰俘問題，新疆問題，與滿洲國的交涉，九一八後蘇聯的對策，中共參與的反帝運動，王明報告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俞秀松 (中共最年輕的發起人) 的個人檔案。俞秀松不幸於 1930 年代在新疆遇害，其個人檔案至今

在俄國仍未解密。

(七) 中蘇文化交流與經濟合作 (1940-1950) (俄文，共 404 頁)：內容雖有點龐雜，仍反映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一般認為蘇聯對中國比較有實質性的大量援助，是從史達林死後 (1953) 才開始。但是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中蘇兩國在 1950 年的往來不僅限於文化人員與黨員的互訪，也涉及蘇聯專家到中國工作的種種具體問題。

(八) 國共內戰談判交涉之會議記錄 (1944-1946) (中、英、俄文，共 3812 頁)：目前已發表關於國共內戰談判的著作，所引用的資料都是用重慶或南京的談判資料，尚未有任何著作是運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¹⁴的資料，其主要原因是北平軍事調處資料尚未開放。本計畫所蒐集的 3800 多頁中文材料是當年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北平代表團寄給莫斯科的材料。其中有共軍在東北的發展即其對國民黨組織調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備忘錄，中國國民黨 (蔡文治)、中國共產黨 (羅瑞卿)、美國 (海斯克或福特) 三方參謀長聯合會議記錄，軍調處執行部聯合參謀長關於國軍整編電文，該處執行部重要來往函電、工作指示、報告、來往電報匯集，停戰工作總結材料，各地小組協議彙集，美方人員「污辱」中共極不友誼、不公道事件摘要，國民黨控告中共阻止小組活動調查表，1946 年 3 月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恢復交通工作概況，安平事件¹⁵備忘錄、參考資料、調查記錄，安平第 25 特別小組會議記錄、詢問證人資料。

最後，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俄國研究人員格魯寧 (V. I. Glunin) 先生、烏索夫 (V. Usov) 先生、格里戈里耶夫 (A. Grigor'ev) 先生、格魯尚茨 (I. Garushants) 先生、潘佐夫 (Alexander Pantsov) 先生、巴卡琉克 (V. Bakaliuk) 女士在資料蒐集方面給予種種的協助。同時也十分感謝當時新聞局與教育部駐莫斯科的工作人員葉秀華女士、朱旭華女士、彭壽山先生鼎力協助；他們不但允許將本計畫不能郵寄的出版品堆放在其辦公室，而且每逢知悉有人要到臺北便托帶若干資料回臺。

13 Houghton 只有托氏的〈從蔣介石到汪精衛：現階段的中國革命〉(Ot Chan-Kai-Shi k Van-tin-Vei u: O Nyneshnem Etape Kitaiskoi Revoliutsii) 一文的定稿。

14 1946 年 1 月，在北平成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監督有關國共停戰、恢復交通、整軍、遣俘等各協議辦法之執行。

15 詳見國防部史政局編，《和談紀實》(下冊)(臺北，民 60) 頁 380-426。